

性转变问题上的儒法斗争

柳建昌

(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研究所)

性转变是生物学、医学方面有时出现的异常现象，在动物和人类方面都存在，但多见之于鸡。长期以来，孔孟之徒利用性转变这种自然界出现的现象，欺骗、恐吓劳动人民，实行阶级压迫，为剥削阶级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发展的好形势下，进一步清除儒家利用这类自然现象散布的流毒，对于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促进科学的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什么是性转变呢？就拿鸡来说吧，通常是公鸡打鸣而母鸡不打鸣，这是正常现象。但有时出现母鸡打鸣的现象。科学实验证明，这是由于母鸡的性腺功能中途转变而造成的。原来鸡的性腺（包括睾丸和卵巢）在胚胎发育时期是由皮质和髓质两部分构成的，前者发育为卵巢，后者发育为睾丸。母鸡体内只有左侧一个卵巢正常发育，右侧一个则很小，正常情况下不发育，由于它缺乏皮质，因此就存在着变成一个睾丸的可能性。通常，也就是当左边卵巢存在时，能分泌雌激素阻止右侧性腺的发育；但若卵巢发生疾病或损伤，因而分泌的雌性激素减少时，右侧性腺即失去了抑制，其原来的髓质即发育为睾丸，分泌雄性激素，所以雌鸡在这种情况下全身羽毛变成鲜艳的颜色，同时鸡冠长大，后趾突出，性情变得好斗，并象雄鸡那样地鸣叫起来，这就谓之性变。

早在公元前10世纪以来，我国即有关于雌鸡变为雄鸡、男性变为女性的记载（《周书·牧誓》、《汉书·鸡祸》、《太平御览》卷887、888，《论衡·无形篇》，《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第36卷，鸡部纪事等）。是世界上有关性转变问题最早的观察。但如何看待性变问题，两千多年来一直贯穿着儒法两家不同路线，不同观点的长期斗争。以孔老二为代表的儒家，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社会，一直鼓吹唯心主义的“天命论”，把自然界的异常现象与社会政治变革联系起来，加以渲染，荒谬地说成这是天意的表现，人间的一切都是由“天”或贯通于人神之间的“天子”安排的，妄图以此欺骗劳动人民，让他们服服帖帖地当牛做马。

与孔孟之徒对立的先秦时期著名的法家荀况，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人

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思想。就是说，自然界有其自己的变化规律，与社会的政治变革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天的各种变化，如日月星辰的运行，四季交替，万物生长变化等，根本不是什么神的意志，而是自然现象。他强调：人们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可以改造自然，做到“制天命而用之”。这是对反动的“天命论”有力的批判。

今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正确评价法家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批判儒家歪曲自然科学的罪行，进一步促进我国科学技术更快的发展，这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现仅就历史上儒家利用性变问题推行反动政治路线的罪行进行揭批。

一、宣扬“牝鸡为晨，反常为孽”，掩盖阶级矛盾

孔老二之流颂扬周王伐纣，曾利用鸡的性变蛊惑人心，为奴隶主卖命。公元前一千多年，周王朝起兵攻打商王朝，周王曾大肆宣扬“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尚书详解》解释为“牝鸡无鸣晨之理，使牝鸡鸣晨则反常为孽，家必索而尽。亦如妇人与政，亦是反常，故足丧国。”企图说明商王朝之所以被周王朝打败，主要原因是商王“不悟牝鸡鸣晨为不祥”，“惟其用妇人之言以乱天下。”其实，当时奴隶主贵族商王纣，由于残酷地压榨、剥削，使奴隶无法生活下去，奴隶与奴隶主贵族之间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达到了非常激化的程度，故当周王起兵攻打商纣时，上万的奴隶在牧野起义，终于把商王朝消灭了。儒家利用宗教迷信的观点宣扬“牝鸡为晨，反常为孽”或由于“妇人与政”造成商王朝的覆灭，是妄图掩盖当时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奴隶主贵族剥削、压迫奴隶的实质。周王伐纣的借口“妇人与政”与孔丘胡说的“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宗教唯心主义的观点，后来经过孔孟门徒发展为“天命论”、“天人感应”等儒家的反动思想体系，流毒极广，为害殊深。

二、捏造“鸡祸”，污蔑农民起义

据《后汉书》追述，在汉朝（纪元前206—220年）期间，不仅出现过“男化为女”的所谓“将有易代之事”的象征，而且还记载了所谓应验多次、预兆天下大乱的

“鸡祸”事件，“灵帝光和元年（纪元前 178 年）南宫侍中寺雌鸡欲化雄，一身皆似雄，但头冠尚未变”的现象出现之后，当时推行儒家路线的统治者怕得要命，立即向朝内儒臣蔡邕质疑；蔡邕在概述了历代儒家把出现鸡的性变都和社会变革相联系的一派胡言之后，又荒唐地说：“（鸡）头，元首，人君之相；今鸡一身已变，未及于头，而上知之，是将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应之不精，政无所改，头冠或成，为患兹大。”接着笔锋一转，赤裸裸地把矛头直接指向农民起义军：“是后，张角作乱称黄巾遂破坏”，“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乱。”恶毒攻击、污蔑黄巾农民起义军奋起造封建统治阶级的反是大逆不道。

东汉著名法家王充，在《论衡》一书中对儒家宣扬的宗教唯心主义思想，做了淋漓尽致的批判：“人受正气，故体不变。时或男化为女，女化为男，……非常性也。”阐明了性变是有机体在特殊情况下的变化，与社会变革根本无关。

儒家运用“天人感应”的论点，歪曲自然现象，为他们的反动路线服务，严重地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被儒家攻击、咒骂的黄巾农民起义，正是东汉时代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当时黄巾起义军高呼“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的战斗口号，起来造封建地主阶级的反，“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他们转战于黄河南北，攻城杀吏，给腐败的东汉政权以沉重的打击，大大削弱了以人身为依附的反动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黄巾起义军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但后来的农民暴动却如星火燎原。所以黄巾起义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给儒家宣扬的谶纬迷信思想以有力的冲击，而且黄巾农民战争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给东汉以来的儒家路线也是致命的打击，对社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儒家捏造所谓“鸡祸”为封建统治阶级残酷镇压农民起义服务，不但挽救不了反动阶级的必然垮台，而且暴露了他们的反动嘴脸。

三、利用性变问题，攻击武则天及其法家路线

在儒家长期统治的封建社会里，鸡的性变问题已成为孔孟之徒污蔑、攻击法家的软刀子。在中国历史上执行法家路线的女皇帝武则天，孔孟之徒把她视为眼中钉，咒骂她当权是什么“牝朝”、“母朝”和“牝鸡司晨”，还对她进行人身攻击，骂她是“狐狸精”、“暴君”。在儒家眼里，乳臭未干的儿皇帝当权才是正统，能干的女皇帝执政就是大逆不道。儒家之所以疯狂攻击武则

天，主要是由于她执行政事“不问诸儒”的法家路线，提拔任用社会地位低下的庶族地主人士做官；主张耕战，实行屯田备战，保卫边疆的政策。从而出现了“时俗浸轻儒学，先王之道，驰废不讲”的局面。我们揭露儒家利用“牝鸡司晨”攻击武则天及其所推行的法家路线，并不意味着全盘肯定她，她毕竟还是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还有其阶级局限性。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以正确的评价。

四、借“牝鸡司晨”鼓吹男尊女卑

长期以来，孔孟之徒千方百计地鼓吹男尊女卑。孔老二不仅辱骂务农的学生樊迟为“小人”，要“鸣鼓而攻之”；而且叫嚣“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在孔丘的眼里，妇女与劳动人民都是难以教养的下等人，是属于“下愚”一类的。后来经过其徒子徒孙发展，在黑《女儿经》中，总结为“百凡事体须卑从，不得司晨啼母鸡”的反动思想。就是说，妇女不得当家做主，在各方面均处于卑从的地位，否则就是“牝鸡司晨家必败，惹得旁人说不贤”。在他们眼里，妇女当家不符合“三从四德”，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根本不能有地位和权利，只配当奴隶，做牛马。这是赤裸裸地为剥削阶级诡辩。

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大肆鼓吹男尊女卑，叫嚣“丈夫的命运决定妻子的命运”。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则散布什么“驴驾辕，马拉套，娘们当家瞎胡闹”，其实这与孔孟之徒鼓吹的“牝鸡司晨”完全是异曲同工。这些反动说教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阻止广大妇女投身于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始终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通过鸡性变问题的探讨，不难看出，在对待自然与社会关系上，坚持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正是儒法两家长期斗争的焦点。几千年来，儒家一贯主张“天人合一”，把自然的“天”描绘成主宰万物的“神”。他们欺骗劳动人民，说什么只要顺应“天”的意志，不要起来造反，“天”就降福，否则就要降祸给人类。他们极力宣扬“贵与贱，祸与福存乎于天”（韩愈：《与卫中行书》）。进而则宣扬“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子思：《中庸》）等谬论。儒家门徒董仲舒把剥削阶级的头目——“天子”荒谬地说成是代表“天”、“神”或“上帝”来统治人间社会的，即所谓“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炮制出君权神授论的邪说。同时还总结出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三》）的形而上学观点，成为反对变革、维护反动阶级既得利益的金科玉律。

（下转第 27 页）

毛主席曾经深刻地指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儒家所鼓吹的唯心主义神学目的论，就是要劳动人民俯首贴耳地做奴隶，永远受剥削。

法家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观点，做为向腐朽没落阶级进行坚决斗争、坚持前进和变革的武器，他们通过当时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自然科学知识，把天和人、自然和社会分别开来，认为天不能主宰人类；自然界的变化与国家的兴亡、社会的治乱及个人的祸福无关。唯物主义思想家桓谭曾提出：“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新论·谴非》）。王充在继承荀况“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观点基础上，指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灾异时至，气自为之”（王充：《论衡》）。法家的“天人相分”的思想是对儒家“天人合一”的天道观的沉重打击和有力地批判。

长期的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实践证明，儒家执行的反动路线及孔孟之道是保守、复古的，它阻碍着人们对自然界本质的认识。法家路线则主张革新、发展，鼓励人们参加变革社会、变革自然的实践，认为人定胜天，逐步掌握社会和自然发展规律，可以做到“制

天命而用之。”使人们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斗争中，逐步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发展，人们对儒家长期歪曲性变问题的反动本质看得更加清楚。性变问题已从没落的孔孟之道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且性变这个生物学、医学上的理论问题，已在发展畜牧业生产上受到大家的重视和研究。例如雄蚕的茧子比雌蚕的茧层率高25—30%；养鸡需要较多产卵量高的母鸡；乳用需要繁殖较多的母牛；雄绵羊（阉术后）比雌绵羊的产毛量增加1.5—2倍；家畜和珍贵毛皮兽的生产，也存在着性别不同，质量各异的问题。

近代科学实验证明，用睾酮处理青蛙的蝌蚪，可使成蛙100%是雄性；蚕的性别转化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人工控制；某些鱼类、鸟类和哺乳动物等，也随着人们需要而获得影响性转变的科学资料。因此，控制生物性变向着有益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前景是广阔而令人鼓舞的。

我们要认真学习，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批判资产阶级，提高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科技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争取为人类做出较多的贡献。